

奇谈

备点录



工商出版社

PDG

图书馆

7

写在卷首的话

我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工作之余“随便翻翻”。于是，书报杂志上的各种奇谈怪论便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不读则已，一读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不揣谫陋，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驳诘的文章。数年间，这类文章不知不觉已发表了二十多篇。近日把它们找出来披阅一遍，不由得寻思：何不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使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读者同志们 ~~有书可读及劳，不累~~ 一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奇文共欣赏，疑义 ~~相与析，不亦宜乎？~~ 这样就有了这本《奇谈备忘录》。

这里需要说明，这本小册子里 ~~剖析的奇谈怪论~~ 仅是我浏览范围内所见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 ~~虽然见到了，也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加以评介，作出反应，使之不致湮没，但限于时间和精力 终未如愿。~~ 至于听友人提及而无缘拜读的，更是五花八门，不可胜计。所以，这本小册子里涉及的种种“高论”虽则奇矣怪矣，却只是九牛之一毛，甚至还不是最尖端的。可以说，这些年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乃至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一不受到责难和攻讦，我们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也无一不受到否定和嘲弄。这决非危言耸听。正因为这样，我深深感到，江泽民同志最近一再强调“讲政治”，强调“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实属切中要害，语重心长。这对我结集出版《奇谈备忘录》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早在十年前，有人就提出：“对于一些互相截然对立的观点，能不能都站得高一点？各种不同的观点也要理解。”这是何等的豁达

大度，超然物外！但可惜我做不到。例如，我不能理解把“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说成是：“为极左思潮在组织上张目”的观点；不能理解认为两极分化、文化滑坡、道德下降“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值得的代价”的观点；不能理解主张“躲避崇高”，赞赏调侃一切的观点；不能理解主张“认钱不认六亲”的观点；不能理解认为“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债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债务人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观点；不能理解把亡命之徒的穷凶极恶归结于进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观点；……。孟子有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既然各种奇谈怪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公开出版的书报杂志上，难道就不容许对它们提出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发表奇谈怪论的地方颇多，但对奇谈怪论批评的阵地却很少。仅据《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透露，90年代以来新创办的“民间刊物”即有十数种，其经费来源，一为“外资型”，“启动及维持费用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海外团体、基金会或私人的赞助”；二为“中资型”，“主要由大陆境内企业或私人独家资助”；三为“广收薄施兼自力更生”型，来自不固定的赞助。他们自诩，这些刊物“一方面得到了国家出版体制‘形式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则实际突破了既有国家出版体制的或严与约束，为‘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成为‘民间性’存在提供了方便”。由于财大气粗，这些刊物印制精美，装帧考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既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国内私人企业家的资助，又受到书报刊大战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经费拮据，处境困难。尽管这样，这些刊物的编者仍坚守阵地，关注思潮，追求真理，砥柱中流。有一位大家尊敬的德高望

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特地捎话向他们致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是没有发表的可能的，只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这些刊物的编者不仅为发表此类文章提供篇幅，而且还对个别拙作做了认真的加工。如《引人注目的奇谈怪论》这一篇，就经过编者精心的修改。因为改得好，我就把改稿收在这里。我谨向这些刊物的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来，既然是“备忘录”，最好是把评介的原文作为附录印在每篇文后。鲁迅当年就往往采取这种做法。他的杂文里还有别具一格的“立此存照”，就是引述披露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加以评点，或详或略，使世态人情，跃然纸上，其印象深刻，令人难忘。虽然我很仰慕鲁迅的这种做法，却不能仿效，因为现在有人遇到批评不是用批评来争辩，而是动辄诉诸法院，对簿公堂。附录原文，这本来是极正常的事，但你怎能断定人家不会以此作为“侵犯著作权”的状由？我可没有打官司的时间和金钱，况且我也不会打官司。但堪以告慰读者同志们的是，我在这里引用别人的观点，都完全忠实于原文，绝无断章取义之嫌。谓予不肖，不妨把原文拿来对照一下。为此，我注明了原文的出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我所评介的奇谈怪论，绝大多数出自我的同胞的笔下，唯一的例外是《“自由”，还是奴役？》。这一篇驳诘的“高论”出自美国前总统之口。他由于东欧的原变和苏联的解体而得意忘形，似乎今后的世界就是美国独家的天下了，于是乘纪念珍珠港事件 50 周年之机，大放厥词，颠倒黑白。这是每一个有机会读到他的“高论”的正直的中国人所无法容忍的，不得不稍稍回敬几句。我之所以要把此文收在这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大家都不应忘记这位洋大人说的话，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口口声声宣扬什么“政治多元化”，但实际上压根儿容不得“一球两

制”，他们念念不忘的既定目标是彻底消灭社会主义，特别是搞垮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对此我们可要警惕啊！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也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快。我历来当作座右铭的是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
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1996年7月

目 录

- 写在卷首的话····· (1)
- 谨防假冒····· (1)
- 引人注目的奇谈怪论····· (5)
- 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之类····· (16)
- 不能走那条路····· (23)
- 评“谣言无害”论····· (26)
- 真假“反封建”····· (29)
- 黄世仁的辩护士····· (32)
- 色情业与“投资环境”····· (37)
- 论“躲避崇高”不可行····· (42)
- 文艺效果问题岂能搅成一锅稀粥····· (49)
- 该受嘲笑的是谁?····· (54)
- 市侩的反讽····· (59)
- 文艺“边缘”说质疑····· (64)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明?
——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68)
- 评一种处世哲学····· (80)
- 评《三句“反动口号”》····· (106)
- 文艺与政治“离婚”的虚伪性
——从邓丽君之死谈起····· (115)
- “个人主义”情结····· (119)
- “六亲不认”辨····· (123)
- “咸与维新”及其他····· (129)
- 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135)

可喜还是堪忧?	(144)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案翻不得.....	(149)
资本家无剥削吗?	(15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科学根据吗?	(158)
如此通胀“规律”.....	(162)
险恶而徒劳的挑拨.....	(166)
“自由”,还是奴役?	(169)

谨 防 假 冒

物质生产领域有假冒。贴的商标是堂而皇之的名优，令人肃然起敬；但所装内容却是地地道道的伪劣，不仅坑害了百姓，也败坏了真正名优的声誉。此风猖獗不治，足以破坏经济建设 祸国殃民。前一阵，“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开展刹了一下这股歪风，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不是没有道理的。

精神生产领域同样有假冒。前些日子，忽然看到一本名曰《历史的潮流》的小册子，挂着帮助人们学习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旗号，却大量推销某些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毒品。稍稍了解一下，这本小册子炮制推销的过程，其行动之诡谲，手段之卑劣，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蒙骗欺诈手段如出一辙。这里，只想就其中一篇由某动乱“精英”化名炮制的奇文略作剖析，以褫其华裘，还其本相。

这篇奇文大肆攻击这么一个主张：“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给它横加了许多罪名，什么“假大空”呀，“不符合实际”呀，“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呀，“为极左思潮在组织上张目”呀，帽子成堆，棍子乱舞。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这一套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这位动乱“精英”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运用自如。

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被这位“精英”批判的这个主张，就见诸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大家也都知道，这并不是1991年“七一”才提出来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多次申述过的原则；这也不是江泽民同志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几上几下反复讨论，集中了全党智慧的产物。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邓小平同志讲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也就是“党的干部路线”；邓小平同志讲的“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也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两者的观点前后完全一致，怎能说这是“不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呢？给这种主张扣上“为极左思潮在组织上张目”的大帽子，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忠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张，对于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来说，难道不应该做到吗？如果领导权落在了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会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一些国家发生的剧变和解体不正是这样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兹事体大，可不慎乎？

奇文的作者对这个正确的主张大加挞伐，说这个要求太高了，脱离实际。果真如此吗？否。我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学得透彻，用得纯熟，确实不容易。但是，此门并不难入，深造也是办得到的。这里，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很多同志是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们学习了就运用，在运用中再学习。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看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为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要他忠于马克思主义，那确实是难矣哉，确实会使他们感到太“脱离实际”了。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曾指出有这样的现象：有些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人能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有些读了许多书的共产党员却走上了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的道路。此类现象现在还有。眼前这位“精英”就是一例。他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研究员，多年来热中的却是反马列。他声称

“马克思主义是过份的理性主义”，“导致了实践中的唯意志主义”；声称“我们必须老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而绝不是单一的指导思想”；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了危机”，“我现在主要从事创立和研究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如此等等。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此人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早在该年2月15日，他就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的王丹讲：“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这是明白无误地在鼓吹动乱。2月26日，他同一些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当动乱进入高潮，有人公开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时候，他心领神会，舌跃异常，在5月上旬宣称：“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如此一贯反马列，以至鼓吹和策划动乱的人物，这次又打着“反左”的招牌，伺机攻击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一点也不奇怪。他的所作所为恰恰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的极端重要性，断乎不能让领导权落到奇文作者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奇文的作者反对“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他到底想把领导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我们采用了他在这里兜售的“毒品”，岂不要导致亡党亡国的结果！

搞假冒活动的人，总是要抢“牌子”的。奇文的作者也不例外。他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其激昂慷慨、深恶痛绝之状可掬，足以使不明底里的人为之动容。他开口闭口说什么“我们和极左思潮的鼓吹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仿佛他是贯反“左”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但稍稍了解一点此人的历史，不对了，他恰恰是“文革”时期大搞假“左”的一员干将，不但有言，而且有行。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诬陷干部、群众，摧残人身，在1987年被定为“三种人”而清除出党。此人反“左”，虽属滑天下之大稽，但也是

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些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他们的臀部，往往都带有“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纹章印记。这些人的特点是善于“左”右逢源，惯会投机取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转如飞蓬，从不害臊。

应该看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今天在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仍应防止“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要谨防假冒。早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总结历史的经验，深刻地指出：“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信哉斯言！当前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应当牢记这个重要结论。此类奇文的出现，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提醒我们：在防止“左”的影响的干扰的时候，要警惕与的东西假冒反“左”之名而卷土重来，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

写到这里，耳际不禁回响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遗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

1992年4月

引人注目的奇谈怪论

(一)

正当全党同志和全国军民受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之际,我们听到了一种大唱反调、对之横加责难的奇谈怪论。请看:

△“随着 1989 年东欧、苏联的巨变和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向往和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20 世纪在最后十年为未来的新世纪所准备的献礼,是科学、民主和理性的伟大胜利”。

△20 世纪“进入 30 年代,欧亚几个大国出现了逆流,这就是德、意、日三国猖獗一时的法西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以及 50 年以后出现在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类自我折腾。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纪的一种‘返祖现象’,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大倒退。历史终于克服了这种倒退……”。

△“1989 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自由的口号,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敌对分子’。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

△“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拐脚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怀疑。”

△“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生产力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

指标,那么值得称道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根据这一‘伟大功绩’,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要实现现代化,却拒绝现代文明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要改革,却在历史潮流面前故步自封;要开放,却不让人民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这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

△“这里应消除一个心理障碍,这就是对‘和平演变’一词谈虎色变的心态。……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和平演变,‘和平演变’与‘改革’实际上是同义词,根本不是吃人的老虎,有何可怕?”

△“有人沿用斯大林的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对某种体制的‘完善’,这纯属形而上学的幻想。”“人类社会是永远在进步的,改革也必然永无尽头,不存在任何预先设定的终极目标。”

△“一个尊重人权、实行法治的民主中国,是 20 世纪 90 年代对未来中国的呼唤。”

等等,等等……

亲爱的读者,您也许以为上述这些话是引自海外的反共报刊,出自西方反共专家或中国逃亡海外的“精英”笔下的对十四大的评论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论断吧!

对不起,错了,错了。这些话是赫然出现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的 1992 年第 5 期上。发行的时间是十四大召开和闭幕的 1992 年 10 月。这些言论是在《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笔谈这个堂皇的栏目之下发出来的。而其作者,又是以“改革理论家”自诩的有点“名气”的人。因此,它就不能不以其极大的尖锐性、鲜明性、针对性,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深思。

(二)

读者很难把上述言论和海外反动报刊、反共专家们的言论区分开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此人所作出的种种论断,人们在海外反动报刊上早已因千百遍地读到而司空见惯了。人们是很难从实质上 and 表达的方式上,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的。

这是不是望文生义的武断呢?

我们不妨来一点简单的直接对照。比如,就是在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就一再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作出了如下论断:

“美国人民刚刚完成了最伟大的使命——民主的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的使命完成了。……美国自1941年12月以来第一次摆脱了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请问,我们又怎么能把布什的论断和上述中国论者对同一个问题的论断区别开来呢?它们不是惊人地相似吗?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能是,布什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看作美国的“胜利”,而这位论者却把它普遍化,肯定它是“科学、民主和理性的伟大胜利”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关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人类已最终“摆脱了战争”的共同的美妙论断,其实连许多西方学者也根本不相信。例如美国《洛杉矶时报》最近提到,一位德国官方研究所的所长就认为,在西方“大多数人都感到清算将至。他们想相信那些声言一切都太平无事的政客,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而前述的中外两个论者竟然把这些谎言当作自己立论的根据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位论者,已经把20世纪德意日法西斯的猖獗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历史前进运动中发生的曲折和失误等量齐观,一概归结为历史的“逆流”了。这与西方反共理论

家把 20 世纪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以及布什做出的“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论断，不是也如出一辙吗？

其实，连西方稍为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十月革命开始的历史，不管经历了多少曲折，毕竟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相反，是德意日法西斯的猖獗，才使世界遭到了“历史大倒退”的威胁和劫难。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这场“历史大倒退”面前，曾经蒙受了最大的破坏和牺牲，充当了反法西斯的主力，为阻止“历史大倒退”，作出了关键性的历史贡献。1956 年美国作家斯特朗就说出了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她说，1940 年的欧洲曾经“害怕要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而这种导致“历史大倒退”的疯狂进攻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儿女们身上被粉碎的”。这个基本事实，难道能从 20 世纪的历史上轻易抹掉吗？

至于中国，则更是这场空前“历史大倒退”的巨大受害者。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付出数以千万计牺牲的代价，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为阻止这场“历史大倒退”作出了突出贡献。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而且最终结束了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侵略、奴役中国的悲惨历史。“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国家得以统一起来，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不仅仅是中国空前的伟大历史进步，而且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进步，特别是对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独立，也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怎么能够把导致“历史大倒退”的逆流和阻止这股逆流的力量相提并论，一概打入“逆流”的范围呢？怎么能把“历史大倒退”和阻止这种倒退、推动历史前进过程中所出现的曲折、失误等量齐观、相提并论呢？

不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包括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

有过失误，甚至有过像“文革”那样的严重失误。可是请问，世界上有过不经历曲折、失误的历史前进的运动吗？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掩盖或讳言自己的失误，而是正视它，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加以改进和纠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过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明证。显然，这些失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总趋势。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抓住革命进程中某些难以完全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加以无限扩大，从而根本否定革命本身，宣布这场革命的非法性，这不正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贯反动伎俩吗？我们从一些国家革命成果毁于一旦的事实中，不是也看清了这种伎俩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吗？这位中国论者，在把社会主义运动同法西斯等量齐观一律打入“逆流”的同时，却对百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武装蒋介石反动派打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用种种方式孤立、打击、扼杀、干涉中国的倒行逆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有什么理由不把美国在世界推行的霸权主义、侵略行径归之于阻止人类历史前进的逆流呢？这无论如何难以说是论者的一种遗忘或疏忽吧！

(三)

当然，中国的这位论者的这种明显的历史偏见，并不仅仅是为了翻过去的案，更多的则是为了从中引出他对于世界，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我们党和国家的目标、方向、路线，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实在未免过于离谱，甚至背道而驰了。

这位中国论者作出的一个最惊人的论断，就是在1989年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历史大倒退”，即“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

这就怪了，难道现在的中国，是“帽子”满天飞、“万马齐喑”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位论者的这些言论，为什么居然会堂而皇之地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广泛宣传呢？他照样拿工资、评职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无所顾忌地发表同宪法与党的决定相背离的奇谈怪论。这种情况确实发人深思。可总不能就说这就是“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的证明吧！更重要的是，由于平息了1989年那场暴乱，我们社会得到空前的稳定，经过调整，我们的经济长足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又怎么能和“文革”联系起来呢？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同“文革”又岂能相提并论？

这位论者在谈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时，对平暴采取了指责的立场。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平息了那场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为目的的反革命暴乱，才导致“民主自由的口号，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敌对分子’”的情况。这完全是颠倒黑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平暴斗争的是非得失。党的十四大对此更作了郑重的结论：“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那些对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寤寐求之的人当然不会同意这个结论。这几年来，喊喊喳喳的不满和非议之声时有所闻，但是像奇文作者这样毫不掩饰地形诸文字，却不多见。这大概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有一点利令智昏吧！

请问，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曾把“民主自由的口号”，“视为洪水猛兽”呢？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不就把“民主”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吗？当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同志一再把处理好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列为